

浙江省  
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课题成果

# 作家的主体意识和 文化重建的镜像

论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创作

陈建新◎著

钱江新潮文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家的主体意识和  
文化重建的镜像

论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创作

陈建新◎著

钱江新潮文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作家的主体意识和文化重建的镜像：论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创作/  
陈建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7

(钱江新潮文丛)

ISBN 978 - 7 - 5203 - 2236 - 2

I. ①作… II. ①陈… III. ①历史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9385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203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丛书总序

浙江大学是一所人文璀璨、名师荟萃的全国重点大学，其前身是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百年浙大，一路风雨，一路辉煌。在这块深厚的土地上，它不仅哺育了马叙伦、马一浮、沈尹默、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张其昀、谈家桢、卢鹤绂等众多的文化名人和科学大师，而且在长期的办学中形成了堪称典范的求是精神。尤其是在竺可桢主政期间，于极其艰难的西迁办学中更是把这种“求是”精神发挥到极致，使浙大声名远播，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浙大中文系办学历史悠久。往远说，可追溯到林启主持的求是书院。办学伊始，书院即开设国文课程，先后延请宋恕、陈去病、马叙伦、沈尹默、张相等著名学者授业讲学——以此算起，中文系已历春秋百有十载；往近说，则源于1920年的之江大学国文系和1928年的国立浙江大学国文系——就此而言，中文系悠然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它前后历经西迁时期、龙泉分校时期，后又融合之江大学国文系、浙江大学国文系两大主脉。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文系被划归由浙大“母体”孵化出来的新的分支——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嗣后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组建的杭州大学合并，称杭州大学；从这时开始，浙大中文系便进入了“杭大中文系”时代，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杭大中文系”的系名，一叫便是整整四十年，并已在社会和学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直到1998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在经历了一番分分合合之后又返回到了

它的母体怀抱。现在的浙大中文系是以原杭大中文系为主体的，自然，它也整合了其他相关的师资力量。

浙大中文系自建系以来，人才辈出，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祝文白、缪钺、刘大白、丰子恺、许钦文、夏承焘、姜亮夫、钱南场、胡士莹、徐声越、陆维钊、任铭善、王季思、郑奠、王驾吾、孙席珍、王西彦、蒋礼鸿、徐朔方等一大批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杏坛名师、学术名流都曾于此任教。他们实践的“传承创造”的学术精神和追求的“卓然独立”的学术境界，为中文系的发展，包括有特色、有影响的学科的建设，也包括有特色、有发展后劲的梯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百年沧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的目标，祈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回顾往昔，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竺可桢老校长在20世纪40年代所讲的这句话的深刻含意，也越发怀念为中文系发展做出贡献的诸多前辈和老师，并油然而萌生了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和发展中文系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浙大中文系已发展成一个实力雄厚、在国内很具声誉和影响的系科。特别是自1995年被批准为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以来，更是在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在全国同类专业的高校排名中一直居于前列。中文系也由原先单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成为涵盖汉语言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三个本科专业和一个影视与动漫编导方向的立体多元、结构合理的“大中文”专业。目前，中文系已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7个二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古典文献学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4个学科为浙江省省级重点学科。汉语史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有在编教师50人，其中教授26人（博士生导师25人），副教授14人。他们不仅在各个学科发挥重要的带头和骨干作用，而且在国内学界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正是在这批以四五

十岁的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核心的努力和引领下，由夏承焘、姜亮夫等前辈学者所开创的，吴熊和、王元骧等名师宿儒所光大的中文系学脉，方能做到承传有自、薪火绵延。

这次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钱江新潮文丛》，所收的是工作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在职教师的系列学术论著。他们中有30多岁的学术新锐，也有五六十岁的年长或较年长的一代学者。涉及的范围，包括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以及影视文学等不同学科。在这里，学科与学科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彼此是有差异的，思维理念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在努力追求和体现中文系传统的“求是博雅”学风。章学诚评价古代两浙学风时曾谓：“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浙大中文系以“求是博雅”为系训，正是因为非求是则无以成专家，非博雅则无以成通儒。所谓“求是”，就是求真、求实；所谓“博雅”，就是求善、求美。这反映了我们力图贯通浙东西、融合古与今的学术视野与意识，以及从传统的学脉中创造新的浙江学派的愿望，也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学术观的一个投影和富有理性的特殊呈现。尽管面对浙大中文系的百年历史和悠久传统，本丛书中的这些成果尚远不能说是“雏凤清于老凤声”，在这方面，我们深知与前辈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中文系数十位教师用心血和智慧浇灌出来的这些学术之果，毕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求是博雅”作了新的诠释，这是很可欣喜的。可看作对中文系近十年学术研究的一次检验，一次富有意味的“集体亮相”。

这些年，由于种种原因，学术浮躁和浮夸之风盛行，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不端行为也屡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文系老师“守正创新”，一方面继承了百年来的优良学术传统，不盲从、不浮躁，以“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严谨求实学风，孜孜不倦地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坚守着学术正道；另一方面不囿于陈说，锐意创新，力求在前人基础上有新的发现，为学术研究做出自己创造性的贡献，这十分难能可贵。而这一点，在这套丛书也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不尚空谈，不发虚词，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崇尚事实为基础，强调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我想，这就是

浙大中文系生生不息的学术传统，它贯穿百年而又存活于当下，已内化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生命，一种支撑当下中文系存在和发展、坚守学术家园的“阿基米德点”。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目的就是弘扬浙大中文系这一学术传统，继往开来，进一步加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为提升和扩大其学术水平及影响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中文系 1984 届校友、浙江通策集团董事局主席吕建明先生的鼎力相助。2007 年 5 月，在浙江大学 110 周年校庆期间，他慷慨捐资百万元支持中文学科建设。他的善举和情意令人感佩，也催发了我们策划并编纂此书的积极性。缘于此，我不仅对本丛书所反映的教师学术才华和追求感到欣慰，同时更对百年浙大中文学科未来的发展前景抱持一份坚定的信心。

钱潮天下奇观，故孙中山先生有“猛进如潮”之赞，学术创新，贵如潮水之猛进荡决；钱潮及期而信，故吴越王钱镠有“日夜波涛不暂息”之感，学脉传承，当如潮水之永不止息。“求是博雅”，就意味着学者既要有弄潮儿那般“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的锐气，也要有“晚来波静，海门飞上明月”的心境。本丛书以“钱江新潮”为名，其微意实在于此。

吴秀明

2009 年 4 月 15 日于浙江大学

# 自序

这部书稿是我的博士论文，完成于2011年。通过答辩后，我被检查出患了甲状腺癌，于是在暑假期间住院治疗，切除了单侧甲状腺和淋巴系统，回家后就像一个重症患者般修养。虽然切片检查发现是最不活跃的乳头状癌，但还是感觉自己一下子没了生活的方向，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本来打算再全面修改这部博士论文，对酝酿于六七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呈爆炸性展现的传统形态历史小说，在发生论角度做一番探索，尤其是对四零五零后的这一茬历史小说作家做一番专题分析。然而，因为这次手术，以及之后的诸多杂事，修改的事情就被拖了下来。

本书研讨的中国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作家，除了姚雪垠出生于1910年、杨书案出生于1935年外，大部分作家都是1940年之后出生。四零五零后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龄段。他们出生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受教育已经是共和国时代了。相对来讲，他们与旧道德和旧文化的联系不是很紧密，虽然不全是出生在新社会，但都成长在红旗下，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比较明显。所以，关心社会变革，关心国家大事，世界观和历史观都带有很明显的红色标记。同时，这个群体也同中有异。姚雪垠先生是旧知识分子，但追求进步，努力以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阐释历史。凌力则以她受到的现代西方文化的熏陶，努力追寻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同时也从改革的角度考察明清的政权更替。与凌力相近的是刘思奋，他使用现代的眼光来考察明清之际天崩地裂的时代巨变时江南知识分子的表现，尤其重视寻找和表现中国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

的起源。相对而言，二月河的创作与中国古典小说的精神联系似乎更紧密。他更注意小说的可读性，在一定程度上把历史传奇化，在政治上却倾向于威权主义。在看待清代的政权上，这些历史小说家的认识基本一致。即清王朝是中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明王朝和清王朝之间的争斗，是中华民族内部矛盾的体现。

要说明的是，我研究的“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重点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类题材的小说中最热门、创作成就也最大的明清叙事。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中，明清叙事是迄今为止创作最成功、成果最辉煌的，所以，研究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不可能绕过它。为何这个历史时期的小说创作最活跃？直接原因和姚雪垠《李自成》有关，但是，这个历史时期是离今天最近的两个封建王朝，素材最丰富，文字记载当然也是最全的，只要关注一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清宫戏”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宫影视剧的繁荣，我们就能理解这一文学现象。明清叙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我对明清叙事研究得出的结论，适合对中国所有传统形态历史小说。

感谢我的导师陈坚教授，这篇序言本来应该请他老人家撰写，但是，前年他的一只眼睛不幸被撞失明，因此我不能劳他的大驾。读本科的时候我就很崇敬陈老师，他在讲台上的风流儒雅和横溢才华令人折服，读硕士时因为对研究话剧兴趣不大而未能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后来有机会攻读论文博士学位，便很自然地选择了陈老师为导师。几年来，陈老师一直关心和督促我写作论文，初稿甫定，他便以极快的速度读完并拿出修改意见。我的论文的完成，与陈老师的悉心指导分不开。

感谢吴秀明教授。吴老师是我亦师亦友的同事，虽只长我两岁，却是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带头人，学业上一直是我的榜样。在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上，他给我的帮助很大。我之所以选择当代历史小说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和我在90年代末参与过吴老师的一项国家课题有关。在我的论文写作与修改的过程中，吴老师给予了我很多具体指导和鼓励。

感谢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的同人们，吴晓、黄健、盘剑、姚晓雷、郑淑梅、李杭春、陈力君、王国英，他们对我的论文撰写都给

## 自序

予了关注和勉励。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张玲燕，结婚之初我还帮着做一些家务，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我渐渐成了家里的“懒人”，大多数家务都被她包了下来，没有她的支持，我恐怕也难以完成这篇论文。

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完成论文撰写的师长、同事、朋友和亲人们！

陈建新

写于2017年8月连续酷暑中

# 目 录

绪 论 .....	1
一 历史小说的概念及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定位 .....	1
二 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研究现状和问题 .....	5
三 主体性理论与本书的研究思路及基本框架 .....	7
第一章 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中国历史小说的转型 .....	14
一 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苏醒 .....	14
二 中国现当代历史小说的艰难转型 .....	25
三 新时期以来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的成就与特征 .....	41
第二章 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创作与历史观 .....	51
一 多种历史观的并存 .....	52
二 历史现象与历史本质 .....	61
三 历史的创造者 .....	68
第三章 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的文化主题 .....	80
一 人的解放与思想启蒙 .....	83
二 文化寻根与文化回归 .....	96
三 革故鼎新与社会发展 .....	112

第四章 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的形象谱系 .....	124
一 农民造反者形象 .....	125
二 帝王将相形象 .....	139
三 “士”文化与“士”形象 .....	150
第五章 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 .....	162
一 史诗品格与史传笔法 .....	162
二 变俗为雅与雅俗共存 .....	173
三 历史写真与艺术虚构 .....	181
结 语 .....	195
主要参考文献 .....	199

素，明确指明所谓“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上已有的人和事为题材，展开文学化的描写而成的一种文类。然而，当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畴时，我们发现，历史小说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概念，因为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历史小说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无法具体明确的学术概念。

第一，“历史”的概念问题。从时间的角度来考察，以现在时为基点，从远古到现代的哪一个时间点属于“历史”的范畴？在物理时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眼前刚刚发生的事情，稍过片刻，就可以说是历史了。但这样宽泛的历史概念，显然不能用在历史文学研究中。诚如郁达夫所说：“或者有人要说，小说里所叙的事实，有时虽有用现在的动词的，然而当我们读的时候，都当作过去的事实看，所以小说中所记的事情，都可以说是历史。或者是国家的历史，或者是民族的历史，或者是个人的历史，这话原是不错，可是我们在此地所说的历史两字，不能作这样广义的解法。”<sup>①</sup> 郁达夫提出了“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作为限制词，作为一种理论阐述，虽然不严谨，但也不失为一种界定。在当代文学领域里，因文化语境而约定俗成的看法是，1949年之后创作的、以辛亥革命以前真实存在过的人与事为题材的小说称为传统形态历史小说（也有学者把时间下限定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前，也就是中国大陆史学界认定的现代之前），而把描写中国现代史（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题材的小说另行命名（十七年时期把描写这段历史的小说称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但这样的命名不仅有时间的限定，而且有主题和题材的限定。新时期以来，描写这个时间段的小说，由于具体表现对象的差别，被分别称为“新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民国历史题材小说”，笔者倾向于统一使用“民国历史题材小说”这一概念）。这样的界定在理论上也不能算严谨，却比郁达夫的定义明确，并且是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流变在理论上的体现。清代诗人赵翼在评价苏轼的诗文时说：“东坡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sup>②</sup> 文学研究也应该如此，从创作实践而非理论推导而来，不严谨也许就是常态。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界定只能是暂

<sup>①</sup> 郁达夫：《历史小说论》，《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

<sup>②</sup> （清）赵翼：《瓯北诗话·黄山谷诗》。

时的。

第二，历史与历史小说的关系，也就是历史真实性问题。历史小说需要忠实于历史记载吗？从字面上看，历史小说自然是描写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和事的小说，而其题材来源，就是以前的历史记载。但是，细考之，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首先是“历史”的概念。历史作为本体，早已离我们远去，我们了解历史，不外乎这样几种信息渠道：文物遗址、口头传说、文字记载，其中文字记载是意义相对最明确的信息来源。文字记载可分为官方记载（所谓正史）和民间记载（包括野史笔记）两类，如翦伯赞所说：“文字的记录，始于记事，故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举凡一切文字的记录，皆可称之为史。”<sup>①</sup>然而，这类文字记录的东西可靠吗？第一，要质疑的是记录者有否目睹了历史中的人与事，第二，是记录者的立场及对此人与此事的态度。我们知道，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历史的各类文字记录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找出其中内蕴的历史真实。这说明，历史文字记录并不完全可靠。连历史学家都不甚信任的历史记载，难道要求历史小说家亦步亦趋地遵奉？然而，完全离开了这些历史记载，历史小说还能算历史小说吗？我们常把历史文学创作比喻为戴着镣铐的舞蹈，说明历史记载对于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性。所以，既不能脱离历史记载，又不能死扣历史记载，这应该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其次，历史小说创作与历史记载之间的吻合度到底多少合适。从目前的历史小说创作现状看，这个吻合度不仅显示出不同作家的写作风格，甚至还是不同类型历史小说的重要指标。马振方在对历史小说下定义时这样表述：“它是以真实历史人事为骨干题材的拟实小说。‘真实历史人事’，自然不含古小说中的虚拟人事，从而排除再生小说；形态限于‘拟实’，就排除了古代与现代、后现代的种种虚幻表意之作。”<sup>②</sup>拟实小说，顾名思义，有一点儿类似报告文学，也类似现实题材中的纪实小说，这两种体裁都需要忠实于事实，但又允许作家在很小的限度内适当虚构。这样的界定，

<sup>①</sup>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sup>②</sup> 马振方：《历史小说三论》，《在历史与虚构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似乎在理论上能自圆其说，但联系当前的创作现状，其实存在着下面两个问题：一是这种所谓拟实，其实是拟“历史记载”，真实与否难以肯定，如果不真实，这个定义的核心要素之一——“真实历史人事”就不复存在；二是难以把当前众多类型的历史小说概括进来。从广义的角度讲，笔者不主张对历史小说与历史记载的吻合度加以限制。也就是说，只要是以历史人事为题材，都可以称为历史小说。但历史小说与历史记载的吻合度可以作为不同类型的历史小说的区分标准，吻合度最低的是新历史小说和戏说类历史小说（马振方所谓的“表意”历史小说），吻合度较高的是古代的历史演义小说以及当代作家创作的传统形态历史小说。

需要说明的是，以吻合度进行这样的区分，并没有价值评判的含义。评价一部历史小说的艺术价值，主要在于其主题的深邃与否、人物的鲜活与典型化程度、艺术表达的完美性与创新度，以及对表现的历史内涵与历史精神的把握，而非与此前的历史记载有多高的吻合度。

从文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出发，可以这样来定义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即把它们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定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创作的，以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生活为题材，描写曾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人与事的小说。狭义的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又可称为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其定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创作的，以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社会生活为题材，以严肃的文学创作姿态、求真求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对历史的某种敬畏感，以历史记载为主要题材来源，以达到真实再现历史面貌的小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1949年和辛亥革命两个时限，是相对的，尤其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后的今天，已经有一些学者对这样的时间限定表示不满，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30年完全可以划入历史的范畴，更有人主张整个20世纪早已成了历史。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还要靠时间的延续。不过，到了那个时期，新的类似问题又会接踵而来）。

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历史小说向来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中，由于党的文艺政策受阶级斗争理论与战争文化的影响，历史小说创作主要侧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成果斐然，尤其是长篇小说，其成就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胜于现实题材

的创作，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创作相对较薄弱。这样的创作态势，因为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出现而开始发生变化。

20世纪70年代，受毛泽东喜爱《李自成》第一卷并对姚雪垠的创作给予关怀的消息的鼓舞，许多作家开始创作反映农民起义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至1976年前后，文坛突然涌现出了一大批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传统长篇历史小说，如《星星草》《风萧萧》《九月菊》《庚子风云》《义和拳》《神灯》《天国恨》《天国兴亡录》《陈胜》等。这些小说明显带有时代特点，作家信奉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学说，以歌颂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为写作目标，作品中充满着浓郁的政治情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全社会文化反思的展开，农民起义题材历史小说渐渐退出主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广义的文化历史小说。刘斯奋《白门柳》、凌力《少年天子》《倾国倾城》《暮鼓晨钟——少年康熙》《梦断关河》、唐浩明《曾国藩》《旷代逸才——杨度》《张之洞》、韩静霆《孙武》、二月河的“落霞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杨书案《孔子》《老子》、熊召政《张居正》等，都曾引起读书界的热忱关注。前六届茅盾文学奖共有5部传统形态历史小说获奖，它们是第一届的《李自成》（第二卷）、第三届的《少年天子》《金瓯缺》（获荣誉奖）、第四届的《白门柳》（一、二）和第六届的《张居正》，如果算上《黄河东流去》《战争和人》《白鹿原》《尘埃落定》《茶人三部曲》《历史的天空》《东藏记》等民国历史题材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创作几乎占据了茅盾长篇小说奖的半壁江山，充分说明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历史小说成了产量和质量都十分稳定的一个小说门类，它受到专家和普通读者的普遍好评。

## 二 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研究现状和问题

中国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历史小说创作的逐步兴旺，批评与研究也相继繁荣起来。吴秀明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评论姚雪垠《李自

成》开始，发表了《从历史真实到现代消费的两度创造》《当代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叙事》《历史文学底线原则与创作境界刍议》《论历史真实与作家的理性调节》等数十篇评论与研究历史小说的论文，并著有《在历史与小说之间》《真实的构造》《文学中的历史世界》《论历史文学独特的语言媒介系统》《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等多部专著，对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小说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既有单部作品的评论，又有对整个历史小说创作的宏观把握，在历史文学创作的许多理论问题上也都有深入的研究，成绩比较突出。除他之外，很多著名学者如严家炎、敏泽、马振方、曾镇南、雷达、张志忠，对这一领域也有较多涉猎，发表过有影响的论文。刘起林、刘忠、杨建华、李宣平、孙文宪、刘克等青年学者在历史小说研究上颇有建树。在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研究中，学术界尤其对姚雪垠、刘斯奋、杨书案、高阳、凌力、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的研究比较深入，有较多富有新意的论文出现。

在研究热点上，新时期最先出现的是对《李自成》一、二卷的研讨，囿于当时的社会情势，这一讨论主要是正面的，很多论文对《李自成》一、二卷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做出了较深入的阐发，但对该书存在的问题缺乏有深度的认识（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出现了具有一定反思深度的评论，但该书作为热点早成过去）。《少年天子》《金瓯缺》与《白门柳》的问世，成为80年代中期传统形态历史小说评论的又一个热点。这三部小说被看成当代传统形态历史小说创作的转型之作，其相继获得茅盾长篇小说奖，与评论界的努力分不开。进入90年代后，唐浩明、杨书案、高阳和二月河的创作又一次成为评论家们关注的热点，唐浩明、杨书案和高阳的作品被看作具有新儒家背景的创作，而二月河的创作更具有大众文化的特征。也有研究者从地域文化角度看待唐浩明的创作，如李宣平、杨建华《湖湘文化与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创作》；从民间文化的角度解读二月河的小说，如刘克《二月河历史小说的田野作业》，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两位作家的创作。进入21世纪后，熊召政《张居正》再次成为评论热点。大部分评论家对这部小说持肯定态度，但马振方对其与史实相违背的某些描写提出异议，从而引发了一场有关史与诗关系的大讨论。讨论双方谁也没法说服谁，但这场讨论告